

# 黄帝时代的物质生活

何炳武, 党 斌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古籍整理与历史文化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 要:** 从历史典籍中搜集相关资料, 基于衣、食、住、行 4 个方面复原黄帝时代的物质生活。研究表明, 黄帝时代的衣、食、住、行标志着当时的华夏先民已进入文明时代, 且具有一定的社会政治意义; 这亦标志着黄帝在中华文明的发源和形成过程中的重大影响。

**关键词:** 黄帝; 中华文明; 农业文明; 衣食住行

**中图分类号:** K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0)03-0014-04

早在黄帝时代, 华夏农业生产突飞猛进, 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特别是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本文就此进行分析, 探讨其文化内涵及黄帝作为华夏人文始祖的历史贡献。

## 一、服饰的变化

追溯衣服的起源, 其根本原因是实用。在寒带和温带地区, 人们很早就披树皮以御寒。在热带, 为了避免烈日的照射、风雨的袭击, 人们也采取一些措施尽力保护自己的身体。他们通常在身体上涂抹一种油脂和粘土, 披盖树叶、树皮, 在身体上绘些花纹等, 在约 18 000 年前的山顶洞人遗址, 已经出土了骨针, 在四川资阳黄鳝溪也出土了骨锥。这些出土的生产和生活工具足以说明当时中国境内原始人群的缝纫技术已具有相当水平。由此可以推断, 大约在旧石器中期, 我们的祖先已经摆脱了赤身裸体的状态, 过着食肉衣皮的生活了。进入新石器时代, 骨针、骨锥大量使用, 纺轮也很流行, 在河姆渡遗址还发现了原始织机的零件。当时人们的衣料基本上可以分为 2 大类: 一种是植物类, 包括草叶、树叶、树皮

以及植物加工品; 另一种是动物类, 包括兽皮、毛、鸟羽等。衣服制作的式样也略有不同, 简陋的一般是一件完整的兽皮, 复杂的是把兽皮中央穿一个洞, 或者把兽皮一端切成一个凹口, 称为头衣或斗篷。

传说衣服的制作与农业的发明属于同一时代。《商君书·画策》说: “神农之世, 男耕而食, 妇织而衣”。《吕氏春秋·爱类》说, “神农之教曰: ‘土有当年而不耕者, 则天下或受其饥矣; 女有当年而不绩者, 则天下或受其寒矣。’ 故身亲耕, 妻亲绩, 所以见致民利也。”这就是中国男耕女织生活方式的起源。

到了黄帝时代, 开始有了麻布制作的衣服, 《淮南子·汜论训》说: “伯余之初作衣也, 綖麻索缕, 手经指挂, 其成犹网罗。”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不少印有布纹的陶片或陶钵, 经专家鉴定属于一种麻布, 每厘米经纬 10 根左右, 稀疏程度确如网罗。吴县草鞋山遗址也有葛布出土。这些发现都说明当时人类除了穿着兽皮以外, 已经开始大量穿戴葛麻质料的服装, 并有了冠冕。黄帝时代还出现了更高档次的丝织衣服。《通鉴外纪》说: “西陵氏之女嫫祖, 为黄帝元妃, 始教民育蚕, 治丝茧以供衣服, 后世祭为先蚕。”这是说黄帝时代已经开始饲养家蚕, 并剿丝织布制作衣服。在中原地区发现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家

收稿日期: 2010-04-30

作者简介: 何炳武(1956-), 男, 陕西黄陵人, 研究员。

蚕茧和陶塑的家蚕蛹,在江南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的良渚文化中,发现了丝带和丝织品的绢。这就使衣服与当时社会的文明联系在一起,成为当时华夏先民进入文明的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帝“始垂衣裳”(《风俗通义·皇霸》)使衣裳具备了文明标志的意义。

黄帝时代在服饰上的重要贡献是发明了“衣”和“裳”。《释名·释衣服》云:“凡服上曰衣。……下曰裳。”《易·系辞下》云:“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尚书大传·略说》曰:“黄帝始……垂衣裳。”这是直接说黄帝作衣裳。《世本》说:“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sup>①</sup>。《轩辕本纪》说:“(黄帝时),有臣胡曹造衣,臣伯余造裳”。这说的是黄帝的大臣作衣裳。孔颖达在疏《易·系辞下》黄帝垂衣裳时说:“黄帝制其初,尧舜成其末,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制衣裳其制长大,故云垂衣裳也。”不管是黄帝还是他的大臣作衣裳,这说明黄帝时代已经有上衣和下裳之分的服装。上衣和下裳这种衣服制作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成为我们的先民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礼记·王制》说:“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这就是我们的先民以衣服的有无作为区别夷夏处于野蛮与文明的重要标准,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sup>②</sup>

黄帝时代衣裳不仅是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还服务于一定的社会等级观念。《易·系辞下》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sup>③</sup>《白虎通义·衣裳》说:“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绌绌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物原》称:“伏羲作裘,轩辕臣胡曹作衣,伯余为裳,因染彩以表贵贱,舜始制裘及黻深衣,禹作襦裤。”《路史·疏仡纪·黄帝》篇说,黄帝“法乾坤以正衣裳”。黄帝将衣服的发明和使用与天尊地卑的取向联系起来,改变了原有的服饰观念,使服饰服务于社会政治的需要。所谓别尊卑,表贵贱,就是标志不同人的社会地位。

除了服饰上的重要贡献以外,黄帝还是冠冕的发明者。《尚书大传·略说》说:“黄帝始制冠冕。”《风俗通义·皇霸》说:“黄帝始制冠冕。”《世本》说:“黄帝作旃冕。”冠冕也是社会地位的一种象征。可见,黄帝在用服饰区别人的尊卑时,不是局限在衣服本身,而且还包括了冠冕以及其他装饰品。黄帝发明的服饰还象征性地表达了其他的一些观念,如《世本》说:“黄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视也;充纁,耳

不听谗言也。”

## 二、食物的变化

人类在学会使用火之前,食用食物时是生吞活剥的,既生吃植物,也生吃兽肉、鲜鱼之类。人类掌握了用火的技术以后,当初制作熟食的方法也是十分有限的,主要是烧和烤。有时会将食物用泥土包裹起来,放在火中烤干,此种方法古称之为炮。郑玄注《礼记·内则》曰:“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利用石板烘烤食物也是较早的发明。《礼记·礼运》注:“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捋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古史考》曰:“加物于燧石之上食之。”煮食方法比烧、烤方法出现要晚。在陶器发明以前,人类对食物的煮食方法主要有石烹法,即先在木制或树皮器皿里盛上水和食物,同时把一些石块烧红,接着把炽热的石块投入水中,使水沸腾,从而把食物煮熟。人类学会制陶的技术以后,陶器便成了当时人类主要的炊煮工具,煮食方法也普遍化了。一般都是以夹砂陶器作为炊具,因为它具有耐火烧烤,不易破裂,导热快的特性。

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谷物加工与熟食器具的制作。黄帝时代的先民在业已发展的煮食习惯的基础上,对煮食方法作了较大的改进。在食的方面,《周易·系辞下》载:“黄帝……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云笈七签·轩辕本纪》载:“(黄)帝作灶。”《古史考》载:“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黄帝作釜甑”。黄帝对食物原料即谷物进行加工,以“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的方法,发明了谷物加工的重要器具。关于杵臼的发明,不同文献记载中也有差异。《世本》称“雍父作杵臼”,宋衷注:“雍父,黄帝臣也”。此外,还有2种说法,一是《吕氏春秋·勿躬》:“赤冀作臼”,二是桓谭《新论》有“伏羲制杵臼之利”<sup>④</sup>。“赤冀”究竟为何人,缺乏相关资料,故而暂时存疑。“伏羲”时代农业尚处于原始阶段,“制杵臼”大概太早。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黄帝臣雍父作杵臼”,显然是采取了《世本》与宋衷的说法。

黄帝时代,随着农业的发展,引发了饮食的重大

① 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

② 《左传》定公十年孔疏。

③ 孔颖达疏:“取诸乾坤者,衣裳辨贵贱,乾坤上下殊体,故云取诸乾坤也。”

④ 《太平御览》卷762引

变化,粮食成了人类最主要的食品,黄帝发明杵臼之后有了对粮食进行去皮加工的技术,这就是所谓“舂”。《说文》云:“舂,捣粟也……持杵以临臼……古者雍父初作舂”,《世本》亦称“雍父作舂”,《黄帝内传》载:“帝斩蚩尤,因作杵臼,断木为杵,掘地为臼,以火坚之,使民舂粟”。甲骨文中的“舂”字是一个用双手持杵临臼捣米之形。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石杵的发现极为普遍,如仰韶村落遗址、西安半坡遗址,皆有发现我们祖先磨制的环舂。

黄帝时代又发明了一种新式的火灶。在黄帝以前,固定的火塘已经出现,人们在烧煮食物时,通常是把炊具放置在热灰中或篝火旁煨煮。黄帝作灶,是在原有火塘的基础上制造陶灶,它可以自由移动,火力比较集中,便于架置炊具。此外,黄帝还发明了陶甑。甑是一种利用沸水升发的蒸气加工食物的器具。正是黄帝发明了陶灶,进一步提升了火的使用价值,才使得采用蒸汽加工食物的方法普遍化。可见,黄帝时代对于改进饮食方式确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黄帝时代陶制饮食器具在考古上已经有许多文物可以证明。1981年,在河南荥阳青台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了一件夹砂红陶的三足覆盆器,据学者考证,这是一种用于火上烧烤的器物,是专门用于烙饼的炊具,并命名为“陶釜”。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史前考古文化中较为普遍地分布着,在年代上以磁山遗址为最早。其后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发展,“从覆盆状陶釜传播的方向看,基本上与史料中记载的炎黄氏族迁徙路线及势力范围吻合”<sup>[1]</sup>。中原地区还发现陶罐、陶鼎等炊具。陶罐是当时人们的一种主要炊具。这种陶罐的残片在古文化遗址里最为常见,可以说俯拾即是。在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2件陶罐,一件内有2只完整的鸡骨架,另一件内有2条鱼骨架,说明陶罐可以烹煮肉类,自然也可以用粮食煮稀饭,用野菜做成羹汤<sup>[2]</sup>。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等遗址中发现了一种陶灶,这种器物高约12 cm,前面有火门,底部有3条矮足,口部下面有3个凸钮,可以把炊器置于其上。与此相似的陶灶,在河南濮阳西水坡、磁县下潘汪等仰韶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到河南龙山文化的早期,对仰韶文化的陶灶加以全面改造,磁县发现的圆桶形灶,在近口部处有4个对称的圆形或椭圆形的灶眼,应当是通风和排烟的孔道,底部一侧有一个灶门,灶身高约30 cm,口径约20 cm。这种陶灶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

### 三、居住的变化

住所不仅是人们休息的场所,也是防御野兽侵袭、躲避风寒雨雪、保存火种和进行炊事活动的场所。远古时代的人类最早居住状态是“穴居野处”或“暮栖枝上”。自然界中天然的山洞、树洞就是他们的栖息之所。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就是人类早期穴居的物证。在中国南方和西南地区,由于天然岩洞较多,穴居习惯延续了很久。人类先是在树上临时栖息,后来“有巢氏”构木为巢,人们“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魏书·僚》)。在人类利用自然能力极为有限的远古时代,只能利用天然的树洞或山洞作为住所。随着利用自然的能力和自身技能的增强,人类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就营建起人工住所了。最古老的人工住所,是一面坡式风篱,进而发展为人字形窝棚,即用两排木桩,将顶部连接起来,外面盖上树皮或树枝,前后留门;也可以后边封死,前面留门。由于人们最初是不定居的,经常改变住地,人工住所十分简易。当农业产生并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人们便开始寻求一种定居生活,住所随之固定化了,建筑的结构和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北方流行土木结构建筑。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有一种园形房子,多在地面上建筑,中间为火塘,其附近有4至6根柱子,房子四周皆有柱洞。这种园形房子的面积为15~20 m<sup>2</sup>。此外还有方形房子,面积为20 m<sup>2</sup>左右。而南方流行干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木构件,发掘报告称,至少有3排(栋)建筑,一般是下部打木桩,形成架空的房基,桩上为横木,铺有木板,人居上面。其上为立柱,有大梁、小梁之分。

《周易·系辞下》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这一段文字为“黄帝尧舜垂衣裳”以后的九事之一,所以这里的“后世圣人”自然应该指黄帝。汉代以后的学者,都已肯定地认为黄帝是宫室的创造者,陆贾《新语》称:“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白虎通义》曰:“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此宫室之始也”,其后晋皇甫谧《帝王世纪》、罗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纪》、高承《事物纪原》,都将宫室的发明归之于黄帝。

黄帝时代以前早已有居住建筑,为什么又说

“黄帝作宫室”呢?这是因为黄帝时代的居住建筑有一个质的发展。黄帝在北方土木结构的住室习惯上,将住室进行分室建筑。在黄帝以前,村落已有一定布局,如半坡遗址、姜寨遗址,这种布局中央是广场,四周有很多房屋环绕,但各独立的房屋内部不分开。而黄帝对原有住室进行改进,实行分室分间。仰韶文化中晚期的黄帝时代,人们建造的房子有半穴地式、地面建筑,有圆形房子、方形房子,房屋结构有单间、套间或单间排房。建造房子时已经会立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建筑模式奠定了5000年来具有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雏形。

最近在河南省灵宝市发现一座建筑面积约500 m<sup>2</sup>的大型房屋基址,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中国传统回廊式古典建筑。该房基设计准确,气势宏伟,在时间总跨度约2000年的整个仰韶文化中是所见面积最大、结构最为复杂、规格最高的远古建筑。显然这不是普通的民居型房屋而是具有殿堂性质的房屋,专家认为,这将使人们对距今约5500年以前的仰韶文化中期(基本上与黄帝时代为同一时期)的建筑技术成就、居住形式、生产力水平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估。该房基位于河南省灵宝市铸鼎原一带西坡遗址的西北部,整个基址坐西面东,室内使用面积为204 m<sup>2</sup>,建筑面积为516 m<sup>2</sup>。它以弧角近正方形的半地穴式主室为中心,四周围以回廊、斜坡式门道伸出回廊外,近门口处有一火塘。考古人员还发现排列有序的柱洞30个,墙壁柱洞37个,门道两侧也发现柱洞13个。房屋布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了一个结构复杂的建筑整体,专家由此推测此屋为四面坡式建筑。

## 四、行与原始交通的变化

关于行,《易·系辞下》载:“黄帝……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古史考》称:“黄帝作车,引重致远”。《路史·前纪七》称:“轩辕氏作,于空桑之北,绍物开智,见转风之蓬不已者,于是作制乘车。”《拾遗记》称:“轩辕变乘桴以作舟楫。”关于舟车的起源,《墨子·节用》有这样的说法:“车为服重致远,乘之则安,引之则利,安以不伤人,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古者圣王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于是利为舟楫,足以将之则止。虽上者三公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饰,此舟之利也。”这就是说舟楫的发明是基于远古人们克服交通障碍、互相

交流的需要。

在极其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原始人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外出都是徒步行走。最古老的交通工具是木棍,它不仅是采集和狩猎的工具,也是人们行走时的拐杖和背扛物品的工具。《礼记·曲礼上》曰:“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木杖就是由棍棒发展而来的。搬运较重的物品,人类最初往往把圆木柱垫在重物之下,借其滚动而移动,但是这种办法阻力大,垫木要多。《淮南子·说山训》说:黄帝“见飞蓬转而知为车……以类取之”,《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车舆部》称:“黄帝有熊氏始见转蓬而制车”,黄帝看到风蓬之旋转而发明了车。实际上是黄帝在人们用圆柱滚动重物的基础上,改垫为轴,并在轴的两端安轮子,最初的车轮和轴是固定的,轴与车轭之间有一个滑动的槽,车身有轭和轩。《路史·前纪七》说:“横木为轩,直木为轭,以尊太上,故名轩辕氏。”黄帝因为发明了车而闻名于世,人们遂以轩辕氏来称呼车辆的发明者。因此,《通考·氏族略》说:“古之得姓受氏者,有以技为氏,以事为氏。”这就是说,轩辕如同有巢、燧人、神农这些称呼一样,是为了纪念发明或发现者的一种称呼。车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大进步,车不仅是人类的代步工具,也为黄帝治理天下提供了有利条件。

原始人砍倒树木横跨小河两岸,便可踏木过河,这就是独木桥。在较浅的河水里,放置若干石块,人们踏石而过,这是最古老的石桥。在较大的河流上,也可用木杆纵横交错,搭成木拱桥。在水急地险的地方,人们发明一种溜索桥。除桥以外,原始人还能够借助一定的工具,如泅渡葫芦就是人类最早的泅渡工具之一,一般是在人身上拴一个或数个葫芦就能巧渡江河了。《周易·泰卦》九二爻辞说:“包(匏)荒,用冯河,不遐遗朋,弗亡(忘),得尚(赏)于中行。”《庄子·逍遥游》说:“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司马彪说:“樽如酒器,缚之于身,浮于江湖,可以自渡。”由此可知,上古时代的人们凭借一只葫芦渡过大河的事情是司空见惯的。除此以外,上古时代的人们还结合树木和泅渡方法,将漂浮在水面上的树木或竹子并排地拴在一起,就成了木筏、竹筏。木筏或竹筏的出现既加大了渡河的安全系数,又增强了渡河的灵活性。

中国古代关于舟的发明者众说纷纭,而大家比较认同的仍然是黄帝。除了前面所引的文献以外,《淮南子·说山训》说:黄帝“见窾木浮而知为舟……

(下转第62页)

## Psychological analysis on the greatness after the ren of Chinese people

JIANG Yong-zhi<sup>1</sup>, ZHANG Hai-zhong<sup>2</sup>

(1. School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 Lanzhou City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Gansu, China)

**Abstract** The bigges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elf of the Chinese and the West is that the self is built o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connotation of self is broader, including person and self of relationship. The self realization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ren. I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virtues, wisdom and blessing.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series of thinking of ren,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dea of greatness after the ren to reveal the re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 people.

**Key words** Chinese people; self culture; the greatness after the ren

(上接第 17页)

以类取之。”黄帝发明舟楫,就是在以前渡河经验的基础上,选择一段粗大的树干,先用火烧去中间部分,然后用石斧砍制成形,制成独木舟的样子,然后又用火烤制木桨。舟楫的制造使得古人的水路交通便利起来。

### 五、结 语

从衣食住行 4个方面复原黄帝时代华夏先民物质生活所表明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相较新石器时期

黄帝时代已进入一个相对文明的社会。房屋的建造、服饰的制作、火的使用、炉灶以及谷物加工与熟食器具的发明创新充分展现了华夏人文始祖黄帝对人类文明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 [1] 张松林. 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初考[J]. 中原文物, 1997, 21(3): 75-88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宝鸡北首岭[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3.

## Material life in the imperial time

HE Bing-wu, DANG Bin

(Institute of Ancient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Culture,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Xi'an 710065,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in this paper collect all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from the historical books to study the material life in the imperial time from clothing, food, dwelling and travelling.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emperors in that time had already entered the civilized life in the above four aspects, which indicates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significance and their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progress and the 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in Chinese history.

**Key words** emperor; Chinese civilization;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clothing; food; dwelling and travelling